

国际食品安全标准的合法性之思

林 静 韩秀丽

摘要: 国际食品安全标准在国际贸易以及国际食品安全规制中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国际食品安全标准的客观性、科学性受到了经济、政治因素的侵蚀;同时,国际食品安全标准制定的程序缺陷,加剧了国际食品安全标准的合法性问题。WTO 应该构建对国际食品安全标准合理性的司法审查,对国际食品安全标准的合法性进行补正。

关键词: 国际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标准; 合法性; 司法审查

中图分类号: DF9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 1569(2014)06 - 0209 - 07

一、引 言

国家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简称 SPS 措施)的协调对农产品自由贸易和食品安全规制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世界贸易组织(WTO)体制下的《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的协议》(简称 SPS 协议)要求成员所采取的 SPS 措施必须基于相关国际标准,国际食品安全标准由食品安全的国际专门机构,即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简称 CAC)制定。通过 WTO 体制,将这种国际标准制定机构纳入贸易体系,已经彻底改变了 CAC 的地位,所谓的自愿标准在判断国际措施是否与 SPS 义务一致中拥有强大的权威和重要的意义。

CAC 标准应该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客观而平等。然而,CAC 标准制定过程与贸易利益的链接,致使 CAC 标准受到非科学因素,例如产业或政治团体力量的影响。CAC 标准的制定偏向发达国家利益,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适用 CAC 标准的情况不容乐观。CAC 尤其是在处理争议或涉及不确定的科学,偏向采取投票方式采纳标准,而不是努力达成共识。这种标准采用方式可能引发纠纷,并需要 WTO 争端解决机制予以解决。

SPS 协议鼓励成员遵循国际标准,那么国际标准的合法性缺失,也就直接影响了 WTO 食品安全规制和食品贸易。WTO 司法机构应该如何应对 CAC 标准的合法性缺陷?仲裁者应该依据什么法律,在多大程度上对 CAC 标准进行评估?合理有度的司法审查对国际食品安全标准以及 WTO 体制都有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食品安全标准的合法性问题

大家对国际食品安全标准制定机构功能的总体评价相当积极、正面。无论是对发展中国家

作者简介:林静,厦门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韩秀丽,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家还是发达国家而言,CAC 标准都是“食品控制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旨在保护消费者的健康以及国际贸易。”^①尽管如此,CAC 标准还是存在合法性的缺陷,减损了 CAC 标准的法律效用,也进一步引发国际贸易争端。

(一) CAC 标准缺乏公平

1、CAC 标准制定过程的权力分配不均。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标准制定上的权力分配不均。发达国家和产业利益集团在国际食品安全标准制定中掌握主导权,CAC 的 26 个专业委员会当中,发达国家居压倒性的多数,其中美国便担任了 4 个委员会的主席国。欧盟成为 CAC 委员会的完全成员后,也力争扩大自己的影响。相反,发展中国家在食品安全标准制定及风险评估的参与上存在不足,且普遍欠缺建立和运行相应的食品安全体系的能力,担任主持国的发展中国家只有 4 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标准制定的参与度上也不平衡。尽管 SPS 协议第 3.4 条要求各成员应尽其所能全面参与有关国际组织及其附属机构,特别是 CAC 等组织,以促进在这些组织中制定和定期审议有关标准、指南和建议的制定和定期审议。但事实上,标准的制定由一小部分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来完成。这意味着,尽管 CAC 标准是全球性的,但更多地反映出特定发达国家之间的妥协与交易。尽管标准草案最初是由 CAC 秘书处来发布,但这些草案往往是由个别国家来起草的。而且,绝大多数的实际起草工作是由一些工作小组来完成的。因此,“北美、澳大利亚和欧盟之外的其它国家,很难在 CAC 标准制定中拥有话语权。无论是否排除了异议,最终只有少数国家,通常是有能力投入人员和精力制定 CAC 草案的国家,主宰了标准的构造……相对较穷的国家或贸易重要性较低的国家,很少介入或产生影响。”^②由于还有其他更紧迫的事务需要财政投入,一些发展中国家甚至无力参加有关标准制定。

2、CAC 标准对发展中国家不利。在标准制定过程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适用问题。虽然一些发展中国家认为,国际标准可以为他们的 SPS 措施提供有益的参考。然而,发展中国家担忧 CAC 标准关注更多的是发达国家的利益。例如,风险评估阶段,通常依据的是发达国家的营养习惯,没有适当考虑发展中国家的饮食模式。况且,议题中的优先识别也受到了发达国家成员的严重影响。这影响了资源的配置,很多情况下倾向于发达国家感兴趣的研究领域。^③另一方面,本应给予发展中国家参与 CAC 标准的援助和支持却没有到位。发展中国家在标准制定过程中的作用有限,症结在于资金。因此,发展中国家将标准制定作为其它紧迫任务中的优先事项。^④经过十年的努力,这个问题也只能达到些微的改善。2003 年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和 WTO 创立了一个为期 12 年的 CAC 信托基金(TFI),以协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其参与 CAC 工作的机会,以及进行国家能力建设。然而,由于食品安全标准关乎国家切身利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形成泾渭分明的利益集团,发展中国家在标准制定上仍处劣势。各种援助计划缺乏整体、长效的机制;发达国家提供的技术和资金援助,无法满足要求。随着一些新的议题(如转基因)加入到议程,标准制定过程不断加快和扩张,科学技术发展滞后以及资金不足,发展中国家参与 CAC 标准制定面临更加严峻的局势。同时,一些国家的代表团也开始涵盖非国家组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简称 NGO)代表。虽然确保不同行为体的参与性,提高了标准制定的透明度,的确提高标准制定过程的合法性。然而,发达国家消费者保护团体的参与,也产生了一定问题,他们希望建立的保护标准,对于发展中国家产业水平是高不可及的。

(二) CAC 标准缺乏科学性

CAC 明确要求相关食品安全标准和建议应该基于良好的科学原则,CAC 食品标准制定的

八个步骤中,第二步要求进行严格风险分析和风险评估,而食品风险评估和分析的主要任务落在科学家和专家的肩上。残留标准制定产生分歧时,两个独立的联合机构须进行风险评估:粮农/卫生组织以及农药残留会议(JMPR)和粮农/卫生组织以及微生物风险评估联合专家委员会(JECFA)。承担风险评估任务的机构和专家理应独立、客观,但结果却令人失望。

1. 风险评估依赖的数据不全面

首先,专家进行评估时所采用的基本数据主要来源于行业,而不完全得到实验室核实。JECFA 的成员应当具有高度的素质和专业^⑤,然而,专家们在审议时并不合理。不完全依靠科学实验得到基本数据,行业数据成为主要的数据来源。例如,最高残留量(MRL)标准的评估与收集的数据有很大关联,而 JECFA 对数据的收集又依赖相关行业提供的数据。^⑥风险评估需要对数据进行审查,这些数据来源于制药公司,而审查的结果对 JECFA 的风险评估有重大影响。^⑦其次, JECFA 数据收集和研究结果没有涵盖所必须的信息。^⑧由于发达国家的话语权高,标准制定过程中的数据主要由发达国家提供,例如美国和欧盟。此外, CAC 食品安全标准应该确保人类消费的健康。然而, CAC 制定的 MRLs 所依赖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动物试验,很少来自人体试验。例如,对雷托帕明的不利影响的数据很少来自人体试验,缺乏对人的肝脏和某些人体影响的信息,很难证实其指数的合理性。

2. 风险管理阶段受非科学因素影响

风险管理的阶段受各种非科学因素影响更深。^⑨首先,审议过程受到经济力量干预。CAC 理应是科学家俱乐部,科学家是主要参与者。当前 CAC 审议的参与主体多样化,除了代表各成员国的政府官员,各种 NGO,也包括行业代表、消费者和环保团体,都可以作为 CAC 会议的观察员参与其中。^⑩况且, NGO 的参与权和影响力却不平等。相比之下,非商业利益团体(NCO)的影响力虽然有增强,但是远远比不上行业团体。^⑪那么,商业利益对标准制定必定会造成影响。其次,国家政治因素对 CAC 标准的审议影响甚大。从国家代表的构成和所处的地位看,行业代表的力量不成比例的远超消费者和环保团体。考虑到 CAC 和 WTO-SPS 体系的紧密关系,行业代表活跃于 CAC,拥有政府授权,影响着国家的立场和 CAC 标准的制定。^⑫如果 CAC 标准有利于国内相关食品行业,这个结果就有利于打开全球市场。因此,无论是政府代表还是行业代表都有足够的动力使用政治影响力促使标准偏离科学结果,服从行业利益。

(三) 国际食品标准制定的程序缺陷

1. CAC 通过合意采纳标准的应然性

民主化的程度是评价国际法律制定合法性问题的重要标准之一。^⑬除了确保参与的普遍性,规则制定的过程中民主化要求应该完全实现,或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过程应当在协商过程中形成合意。合意可以确保国家,无论弱小或强大,都有议价的能力。^⑭当然,合意不是国际规则制定的唯一理想模式,必须区别对待。其一,不能妥协或者不能达成一揽子协议的情况下,合意的决策模式并不适用。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必须为合意的达成做出让步或者妥协。但是,谈判不能保证这种妥协或者合意一定达成,也可能产生较弱或者含糊的承诺。^⑮例如国际人权立法通常由多数投票完成,允许参与者留下反对意见。其二,需要建立相互依存的政治制度时,例如国际贸易或国际公共物品的治理,就需要形成合意。^⑯CAC 标准制定涉及人类公共健康和公平贸易。因此,决策的方式不宜采用投票方式。由投票通过有争议的标准,可能会导致成员之间严重的敌对或不信任。况且, WTO 决策规则采取合意,而不是投票。考虑到二者在食品贸易的规制中的密切联系, WTO 和 CAC 规则制定的步调一致非常必要。

2. CAC 标准缺乏合意的实然性

WTO 成立之前,CAC 也不曾通过投票制定食品安全标准。^①SPS 协议要求 WTO 成员遵循国际标准,包括 CAC 采纳的标准,显著改变了 CAC 审议会议参与者的状态。如今,CAC 标准在法律中和经济上都有重要的地位。对进口国而言,若 CAC 标准支持并体现出该国家的规制,贸易伙伴很难通过 WTO 体系控诉该规制措施不符合 WTO 义务。^②对出口国而言,如果食品安全与 CAC 相符,将对那些采取高于 CAC 安全标准的国家施加更多的压力和成本。^③因此,CAC 成员越来越不愿意对那些与国内不同的标准做出妥协和让步。此外,形成合意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 CAC 的利益相关者的数量增多,且更具有多样性后,合意更加困难。^④寻找到一定数量立场相同的国家,CAC 的成员就有足够的积极性促使进行投票,通过符合国内利益的标准。

如此一来,合意通过 CAC 标准的方式便失去主导地位,特别是高度争议的问题。^⑤CAC 以投票方式通过的标准,事实上都颇具争议,也容易引发贸易纠纷。无法形成合意,也就无法保障标准制定的透明度。秘密投票的进程更容易受到商业和行业标准的影响。例如 CAC 制定的天然矿泉水标准,显然受到欧盟国家政策的影响,而非出于对人类健康的保护。

三、WTO 对 CAC 标准的司法审查的缺失

CAC 标准的合法性问题,需要从内外两个路径进行补正:一是内部的改革,增加透明度,保持公平,防止利益集团干扰;二是增加外部问责制度。^⑥内部的改革的确有一定的效用,但是,依然存在含糊性。关于外部问责制度,WTO 对于 CAC 标准的审查,是最为密切并可行的有效方式。然而,WTO 是否有权进行国际标准的司法审查?WTO 对于 CAC 标准进行司法审查的态度如何呢?

(一) 内部改革不能完全解决合法性问题

当然,新修改的《程序规则》第 7 条中规定,只有达成一致意见的这种努力失败时,才可经投票做出通过标准的决定。修订后的规则肯定了合意在决策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在内部标准表决问题上,以前是半数同意通过即可,2004 年修订的《程序手册》中,标准的表决须 2/3 多数同意,弱势技术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多的权力,这无疑是在硬机制上增加了审议的透明度,更加公平。然而,这个标准并不排斥进行投票的可能性。况且,《程序手册》没有明确界定“形成合意”的概念,也没有表述清楚什么情况下属于规定的所有达成合意的努力全部失败,应该符合哪些要件,甚至没有规定投票的规则以及有权发起投票的主体资格。这些问题的含糊性,也导致使用投票制通过标准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此外,投票制的贯彻也有问题,CAC 下属的委员会可能会忽视寻求合意,以求投票。根据委员会的指南,主席应该努力达成合意;如果委员会的决策可以通过合意达成,不能要求委员会进行投票。与《程序规则》相反,指南使用较弱的表达方式,对于合意的要求没有同步。这些附属机构若遇到与委员会相同的问题,更难抵制投票制便利性和效率性的诱惑。

(二) WTO 国际标准司法审查的争议

支持 WTO 进行司法审查的理由有两点:一是 WTO 和 CAC 各自的功能类似于国内宪政体制下的权力分立。经济全球化刺激国际组织不断“造法”去规范其行为,并且努力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用“准司法”的方式处理相关纠纷。CAC 为食品产品拟定了国际标准,但它自身并没有争端解决的机构,当发生国际食品贸易纠纷时,WTO 会在自己的争端解决机制中处理,呈现出专门机构从分散走向融合的局面。在 WTO 框架下 CAC 标准的适用必须通过 WTO 的合法

性审查。二是 WTO 司法审查能够促进 CAC 标准的效力。WTO 司法机构的审查可以为利益相关者提供程序保护。此外,审查能够减轻 CAC 的一些决策问题,例如代表不足和公平问题。^{②3}反对者的理由主要是,WTO 体制没有明确授权进行国际标准的司法审查,在 WTO 管辖的多边协议《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中也没有明确授权这种做法。况且,CAC 的文本并不是 SPS 协议的一部分,故而不应认为 CAC 的决定属于 WTO 法律适用的部分内容。即便承认 WTO 裁判者有审查非涵盖的协定(non-covered agreement)的经验,WTO 的裁判也不能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去审查 CAC 标准。^{②4}否则,这种行为可能面临与 CAC 已有的意义、目的和功能产生冲突。此外,缺乏明确限制法律适用领域的问题,就难以保证审查的合法性。

(三) WTO 争端实践中对国际标准司法审查的态度

首先,判例实践否定了对于 CAC 标准制定的程序进行审查。例如在牛肉激素争端中,欧盟提出对激素标准提出质疑,认为激素 MRL 不是经过合意达成,只是反映一些成员的意见。欧盟认为,这个决策方式与 CAC 正常的合意决策方式不同。然而,专家组认为,标准审查应该限定在成员的措施与协议 3.1 条是否兼容,并认为不需要考虑标准的制定是否按照特定的方法进行。^{②5}随后的沙丁鱼争议中的裁决,WTO 保守的裁判方式没有改变。欧盟认为,CAC 标准没有遵循程序规则。根据 CAC 标准制定规则第 8 步,提交任何需要大量修改的标准,需要发回委员会进一步进行评论。事实上,这个标准未能遵守这个规定。因此,欧盟请求:标准并不符合《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简称 TBT 协议)第 2.4 条规定的相关标准。同样,该案的专家组没有支持欧盟的观点,认为 TBT 协议的要求没有涵盖对标准制定的程序进行审查。因此,拒绝审查标准是否满足正当程序的要求。^{②6}其次,判例实践中否定了合意形成 CAC 标准的重要性。沙丁鱼案中,欧盟认为,标准的采纳不是基于合意的基础,与 TBT 委员会要求在标准制定过程中的合意原则不符合。专家组并不认同在标准制定的过程中,TBT 协议应享有决定性的地位。反之,专家组认为,TBT 委员会合意原则没有明确陈述在 TBT 的文本中,只是“一个政策偏好的声明”。^{②7}此外,专家组指出 TBT 协议附件 1.2 条的最后两句,即使标准的采用不是通过合意,也可以构成相关的国际标准。上诉机构同意专家组的观点,并且承认 TBT 确认的标准,不需要通过合意。^{②8}总而言之,WTO 的司法实践可以看出,WTO 尚未对国际标准制定过程合法性进行审查,并且不具有对其审查的合理依据。

四、WTO 国际标准司法审查合法性的构建

WTO 对国际标准的司法审查,是 CAC 标准合法性问题补正的有效途径。然而,无论学界还是判例实践都缺乏 WTO 对其审查的合理、合法依据。因此,WTO 对国际标准合法性司法审查的构建,意义重大。

(一) WTO 司法审查的意义

虽然 DSU 没有明确授权 WTO 进行国际标准的司法审查权。但是,从食品安全具体情况进行分析,WTO 应该赋予这种司法审查的自由裁量权。首先,从 SPS 协议与 CAC 标准的特定语境分析,这种司法审查具有合理性。SPS 协议的语境下,健康相关的协议不仅确认 CAC 指定相关标准的权威,同时也将科学的非贸易标准带入 WTO 体制。本质上,为了追寻全球食品安全标准的统一,CAC 标准与 WTO 体制已经密不可分。这种密切、动态的关系,意味着 WTO 和 CAC 之间的界限与其他国家机构完全不同。其次,WTO 对 CAC 标准进行司法审查,可以保障 SPS 协议的效力。SPS 协议具有保护人类健康和保护贸易自由的双重目的。CAC 标准缺乏

科学性,更多体现商业标准,不仅损害了成员的合理贸易利益,也可能触发不良的贸易竞争手段,影响国际贸易秩序。另一方面,CAC 标准存在的程序缺陷和客观性缺失,也难以确保食品安全的宗旨。因此,WTO 的司法审查忽视这些问题,也是非法、不合理的。如果 CAC 标准制定未能遵守本身的科学原则或者正当程序的要求,那么 WTO 缺乏司法审查,也将严重破坏 SPS 协议的宗旨。

(二) 通过合意或者签订协议构建合法性基础

司法审查被视为确保国内宪政结构实现法治的民主机制。如今,越来越多的观点认为应该创建制约国际组织的机制,以保障国际机构的决定不影响国家,也不影响个体的利益。例如,国际法院(ICJ)被赋予了这种行动的权力。ICJ 对联合国机构例如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的决定有司法审查权,对安理会关于洛克比和波斯尼亚事件进行了审查。然而,ICJ 与安理会属于一个体系,而 WTO 和 CAC 不属于一个体系:WTO 独立于联合国体系,CAC 却属于联合国体制。也就意味着 WTO 和 CAC 在国际法下是平等的,那么就无法参照国际法院的例子。当然,如果有足够充分的法律依据,不同国际机构间依然可以进行审查。这种法律依据,首先体现为对 WTO 的干预形成共识或者达成协议。然而,虽然 WTO 执行机构,例如 SPS 委员会努力协调,但很难达成共识。那么,无法达成共识时,WTO 也应当采取一些解决方案,确保审查具有更大程度的合法性。例如,WTO 的文本、SPS 协议或 DSU 应当进行适当的修改,构建良好的司法审查框架。^②新添加的规则可以让司法裁判者在正确的方向上履行职责。如果难以实现这样的修正,总理事会或部长级会议也可以采取权威解释,支持这种司法审查权。

(三) 对 CAC 标准司法审查进行严格限定,增强合法性

首先,必须确定司法审查的标准。从实用角度看,WTO 无法对 CAC 标准的实质内容进行审查,CAC 标准所需的食品专业知识和相关判断能力,这些要求都超出了 WTO 司法机关的能力。牛肉激素 II 案的上诉机构,确立了对国家 SPS 措施进行司法审查,接近顺从的审查标准,但是不完全属于程序审查。对于科学依据必须进行实质性的审查,以评估认知存在的最小阈值。然而,对于科学结论是否正确不能进行审查。参照这个标准,WTO 对 CAC 的标准审查,应该留给 CAC 更多的自由权。因此,WTO 司法审查应该偏向于程序审查。相应的,WTO 可以以其它方式解决专业能力和知识的缺失:例如运用行政原则,包括透明度和咨询,对 CAC 立法程序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或者通过其它国际组织的实践和操作,例如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可以作为评估 CAC 标准制定过程的工具。其次,必须适当界定司法审查的效力。司法审查效力有三种可能性:决定无效,决定关联适用不恰当,陈述不一致。^③第二种选择比较适合处理这种国际关系,第一种太强,第三种太弱。这个模式适用于 WTO-CAC 的语境,假设 WTO 宣告 CAC 的标准无效,可能干预过度;如果宣告 CAC 标准的陈述不一致,又产生不了足够的法律成效。过犹不及,WTO 对 CAC 司法审查必须根据国际法的原则、WTO 善意以及国际机构的实践确保审查的合法性。

五、结 语

SPS 协议对 CAC 标准的承认,起到了桥梁的作用,把 CAC 与 WTO 有效地连接了起来。虽然,在法律文本上并没有出现强制适用 CAC 标准的字眼,但是通过 WTO 的争端解决方式,已经使 CAC 标准的非强制性名存实亡。正因为 CAC 标准具有事实上的拘束力,CAC 标准的合法性问题的补正更加意义重大。虽然通过内部改革是 CAC 标准合法性解决的关键,但是外部

问责的作用也不可忽视。WTO 应该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处理 CAC 标准制定的相关问题,不仅需要尽可能的通过合意或者签订协议 构建 WTO 司法审查的基础,还应该严格限定司法审查的范围 将审查限于程序。WTO 对于 CAC 司法审查不能直接推翻 CAC 的标准,只能提出 CAC 标准的合法性问题,从而认定标准不具有 WTO 协议中国际协调原则的法律效力。

注释:

- ①③FAO/WHO, Report of the Evaluation of the Codex Alimentarius and Other FAO and WHO Food Standards Work (2002) . p. 6 p. 30 p. 39.
- ②Scott, Joanne. The WTO Agreement on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Measures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70.
- ④Victor, David G. . The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Agreement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 Assessment after Five Years [J]. New York Univers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 Policy, 1999 - 2000, (32): 886.
- ⑤⑨Peel, Jacqueline. Science and Risk Regula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94.
- ⑥⑧②④Masson - matthee, Marielle D. The 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and Its Standards [M]. The Hague: TMC Asser, 2007. p. 68 p. 190 - 191.
- ⑦Moy, G. G. 、Wessel, J. R. Codex Standards for Pesticides Residues [A]. Rees, N. & Watson, D. (eds.) .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for Food Safety [C]. Berlin: Springer, 2000. p. 215.
- ⑩⑪⑰⑲⑳Livermore, Michael A. Authority and Legitimacy in Global Governance: Deliberation, Institutional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Codex Alimentarius [J].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2006, (81). p. 784 - 785 p. 787 p. 789 p. 790 - 791.
- ⑫Wallach, Lori M. Globalization and Sovereignty: Accountable Governance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The WTO, NAFTA, and International Harmonization of Standards [J]. Kan. L. Rev. 2002, (50): 836.
- ⑬⑭⑮Boyle, Alan、Chinkin, Christine.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Law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55, p. 101 - 102 p. 159.
- ⑯Buzan, Barry. Negotiating by Consensus: Developments in Technique at the UN Conference on the Law of the Sea [J].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81 (75): 329.
- ⑰⑱《SPS 协议》第 3. 2、3. 3 条。
- ⑳Stewart, Terence P. 、Johanson, David S. The SPS Agreement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Roles of the 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the International Plant Protection Conven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ffice of Epizootics [J]. Syracuse Journal International Law & Commerce, 1998 (26). p. 45.
- ㉑曾文革、田璐《WTO 框架下 CAC 标准的适用析论》,《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年第 19 期。
- ㉒EC - Measures Concerning Meat and Meat Products, WT/DS48/R/CAN, para. 9. 72.
- ㉓㉔Panel Report, EC - Sardines, WT/DS231/R, para. 4. 34.
- ㉕Appellate Body Report, EC - Sardines, WT/DS231/R /AB, para. 227.
- ㉖Steinberg, Richard H. Judicial Lawmaking at the WTO: Discursive, Constitutional, and Political Constraints [J]. American Journal International Law 2004 (98): 257.
- ㉗Klabbers, Jan. Straddling Law and Politics: Judicial Review in International Law [A]. MacDonald, Ronald St J. & Johnston, Douglas M. (eds.) . Towards World Constitutionalism: Issues in the Legal Ordering of the World Community [C]. Dordrecht and Boston: Martinus Nijhoff, 2005 p. 833.